

廣州文史資料

(選 輯)

第 十 八 輯

附
第十八輯
新目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州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州日报印刷厂印刷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10.375印张194,000字

1980年3月 印数1—6,000

书:号11111·60 定价:1.05元

目 录

参加革命的片断回忆 潘云波口述 (1) ✓

大革命时期广州学生运动 陈志文 (13) ✓

一、促进学生群众反帝反封建觉悟 (16)

二、培养大批革命骨干 (20)

三、改组广州学生联合会和组织广东全省学生
联合会 (22)

四、办理平民教育 (25)

五、反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运动 (28)

六、“香港学生联合会”及其反帝罢课斗争 (34)

七、大革命时期各学生团体概况 (38)

大革命时期罗定农民运动纪实

..... 李友庄、李锐春 (51) ✓

一、农民协会的初建及其迅猛发展 (52)

二、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斗争 (54)

三、召开全县公民大会、斗争浪潮空前高涨 (57)

四、蒋帮“四·一二”政变李芳春惨遭杀害 (60)

五、永不熄灭的革命火焰 (62)

、黄埔军校历史概略.....陈以沛、赵丽屏(辑录) (67) ✓

一、军校由来..... (67)

二、创校思想..... (71)

三、军校机构..... (73)

四、军校教育..... (76)

五、军校战功..... (81)

六、内部斗争..... (85)

七、军校变质..... (91)

八、结束语..... (94)

“赭庐”的回忆.....李韶清 (99)

✓“双十二”西安事变中活捉蒋介石亲历 ✓

追忆.....商同昌 (101)

✓西安事变前后流行的三支歌曲.....商同昌 (106)

✓湛江(西营)起义.....邱德明 (108)

一、起义前准备情况..... (108)

二、起义..... (122)

三、敌人疯狂反扑..... (135)

四、突围..... (138)

五、编为人民解放军，参加解放战争 (140)

✓北上投蒋后和抗日初期的国民党广东空军

..... 黄绍濂 (144)

✓抗日战争中余汉谋与日侵略军的勾结

..... 何崇校、刘非、周养浩 (153)

✓华侨血汗沃美洲.....谢 创 (167)

✓旧金山天使岛的斑斑血泪

..... 黄大锵、林仲芬(编撰) (171)

一、移民美国概况..... (172)

二、人间地狱的天使岛..... (176)

三、天使岛同胞的英勇反抗..... (182)

四、美国对我侨胞态度的变化..... (185)

五、今天的天使岛..... (187)

✓解放前广东最大的一个帮会——洪门忠义会

始末 何崇校 (191)

✓著名粤剧艺人马师曾.....张 洁(编撰) (235)

✓广州饮食业史话.....邓广彪 (271)

参加革命的片断回忆

潘云波口述

按：潘云波同志口述的本篇史料，是从中共广州市委党校索用的，是党校胡提春、王焕秋同志根据该校领导布置赴海南岛访问潘同志而记录、整理的，史料内容提到了各个革命历史阶段的事实，对研究党史有一定参考作用。发表前本想请党校胡、王两同志再到原地访问、补充，但不幸潘同志已经逝世了。潘同志生前任海南区党委统战部付部长，他已近八十高龄了，还积极提供革命史料，这种精神是十分宝贵的。

(一)

我是广东省文昌县人，1901年出生，1919年在文昌中学读书时就参加了“五四”运动，是该校学生会领导人之一。当时听到北京大学学生郭钦光带病“奋袂先行”，在火烧赵家楼反对卖国贼曹汝霖时，被其家人和卫兵打致重伤于五月七日不幸逝世的消息后，我们无比义愤（郭钦光是我们文昌

县人），全校学生非常激动，热血沸腾，誓为郭钦光烈士报仇。我们就组织大家示威游行，向群众宣传“五四”运动的经过和意义，开展抵制日货等活动，搞得很热烈。通过这一运动，我们的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认识到只埋头读书不行，必须关心国家大事。因而对一些宣传新文化运动的文章、杂志等就比较注意看了。这是我青年时代受到的一次启蒙教育。

（二）

1924年我进入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后改为中大农学院）读书，直到1926年3月才离开广州。这两年中，我在思想上政治上都有很大的变化，从一个单纯无知的青年，变成一个初步懂得革命道理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我的思想变化主要是受到陈独秀的影响。当时他经常到广东高等师范学院（即后来的中大文理学院）作演讲，宣传社会主义理论和苏联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使我由同情无产阶级革命到直接参加革命活动。那时广州已有TM（即十人团，参加的人有李大钊、刘尔崧、阮啸仙等人），CP（共产党）及SY（社会主义青年团）等革命组织，新学生社（这是SY的外围组织）也在各学校普遍组织起来了。为了斗争的需要，我于1924年3月由杨善集、冯平两同志介绍，参加了新学生社，从此，我便积极地参加学生运动，成为新学生社支部的

负责人之一。1924年10月，又由刘锦汉同志介绍我加入CY（共产主义青年团）。那时农校学生中我是第一个参加这个组织的。由于CY的人数太少，没有条件成立支部，我就被指定在中大医科学院（即前公医学校）和柯辉萼同志（即解放后中山医学院院长柯麟同志）等共同过组织生活。不久，农科内由我介绍了三位同学参加组织，这时才在农科正式成立起CY支部，由我担任支部书记。当时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发展CY组织，积极配合领导学生运动。

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之后，中国共产党便领导全国人民掀起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高潮，在全国革命形势的推动下，广州人民于六月二十三日举行有十几万人参加的支援“五·卅”运动的游行示威。当我们的队伍行到沙基时，英帝国主义竟然开枪杀害游行的群众，造成“六·二三”惨案，于是爆发了抗议和制裁帝国主义暴行的规模巨大的“省港大罢工”。工人这一革命行动，得到各界群众的积极支持。当时学校里也组织起学生军。我出于对英帝国主义的仇恨，便报名参加了学生军，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才正式毕业，我就在学生军训练期间由CY转为CP（中国共产党）的。这是我的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变化。当时我就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都贡献给共产主义的事业，接受党的考验和交给的艰巨的任务。

学生军毕业之后，经过组织调派，我到东园“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做工运工作，负责组织工人纠察队，保卫省

港罢工委员会领导机关的安全，维持社会秩序。同时，又参加琼崖革命大同盟的活动，我在省港罢工委员会仅有两个月的时间，党又调我去南洋做工运工作。

(三)

党为了把侨居在南洋群岛的中国工人和各界群众组织发动起来，支援国内的革命斗争，在我去之前已派过五位同志到南洋各地工作，许侠夫、黄昌伟（都是海南人）就是其中的二个。主要是搞些青年和工运工作，但当时在华侨中还没有党的组织活动，既没有共产党也没有中国国民党（改组后实现国共两党合作的党）的组织，只有共产主义青年团，直接受团中央任弼时同志的领导。因此，许多人年已三四十岁，胡子长长的还是共青团员。1926年3月我到叻（即今之新加坡）后，便在马六岬任华南小学校长，用这间学校来做掩护进行活动，开展工人运动的工作。这时由上海与广东党派去五位志，同分散在叻（新加坡）岬（檳城）岬（马六岬）等地区工作，我就被指定为马六岬埠工作的负责人之一。那时各埠都举办工人夜校，吸收工人参加学习，又读书又唱歌，灌输革命思想，在陈嘉庚、胡文虎、莫彩雄等十多间华侨资本家工厂里做工的工人都来参加学习。这时，由于组织支持国内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召开悼念“五·卅”惨案“六·和二·三”惨案中遭日、英帝国主义杀害的同胞的大会，数十

个革命同志和工运的积极分子被英国殖民政府逮捕、驱逐出境。其中包括我党在叻坡（即新加坡）的负责人黄昌伟、许侠夫等同志。这样叻坡工作处于无人负责状态，于是党便决定由我负责叻坡的领导工作。当时虽然发生了英国殖民政府逮捕和驱逐革命同志的事件，但在祖国革命发展的影响下，侨胞的政治思想觉悟不断提高，接受我们党的领导，因而团和工运、学运的工作仍继续发展。那时团员已有四五百人。南洋各地已组织起数十间夜校，同时成立了南洋总工会的组织，我是南洋总工会的委员长。下属有许多行业工会，如由一百零八间学校老师组织的教育工会、印刷工会、油业工会、橡胶工会、建筑工会、鞋业工会、药材工会、店员工会等等。由于工作的开展，领导骨干就显得不够了。于是在1926年10月，中共两广区委又派叶博真、何炎之、廖独航等三人前来加强领导工作，成立共产党南洋临时委员会，受第三国际领导。何炎之任委员长，叶博真（1931年牺牲）负责宣传，廖独航（回港后当了叛徒）负责组织，我则负责青年和工人运动工作，并担任共青团南洋委员会委员长和南洋总工会委员长。另外还有傅大庆（后来到上海投靠蒋介石）、徐天炳（1932年在汕头牺牲）、詹行祥等人，也是当时的负责人之一（何炎之和詹行祥后来情况不明）。南洋临委成立之后，便把党团组织分开，在原来的共青团员中，规定二十三岁以上的团员转为共产党员，约有三百人左右，在二十二岁以下的仍为共青团

员，约有二百多人。组织调整以后，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更高了，不仅在华侨中而且在当地居民中的进步分子也要求参加共产党。我亲自接待过由印尼、马来西亚两地进步人士派出的代表，他们衣袋里写着我们学校的地址，在校门前问：“中国共产党在那？”我快快把他们带进内面去，告诉他们：好在碰到我，不然，碰上英国当局的密探，你们要吃亏的，要他们注意敌人的破坏。我听了他们的来意之后，知道他们是想学习我们的经验，也组织起共产党来领导革命的，便把一些关于党的基本知识向他们宣传，要他们学习马列主义，在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不久，印尼、马来西亚都各自建立起共产党组织。

革命形势的日益发展使帝国主义害怕起来，从中进行破坏，指示一些烂仔在路上埋伏殴打我。事件发生后，我们就发动工人，进行罢工，给予回击，这给英国当局震动很大。因而更加通过各种卑鄙的手法污蔑我们，把共产党人说成是长头发，红眼睛，六亲不认，共产、公妻的野蛮人。企图使群众不敢接近党团组织。

鉴于当时我党已经与中国国民党实行合作，为了消除一些群众的思想顾虑，便组织起南洋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中国国民党，成为中国国民党内的左派，大力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这样，得到群众的拥护，积极参加各种革命的组织。1927年3月12日，为纪念孙中山逝世二周年，我们发动了几千人游行示威，因为队伍太长，阻碍交

通，使电车不能通行，当游行队伍到达大坡牛车水时，便和英警发生冲突，这就是南洋的“三·一二”惨案，死伤不少人。为了抗议英国当局镇压群众的罪行，我们又发动罢工、罢课、罢市，英帝国主义认定这个事件是潘先甲（当时我的名）组织和发动的，便下令通缉我。为了避免英帝国主义的追缉，党组织就于五月份派我回国参加武汉召开的CY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原想要求国民党政府和各界人士给以我们声援，但由于这时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公开叛变革命，形势非常紧张，到处捕杀共产党人、革命群众，因而不得不又于同年九月秘密回到新加坡。

1927年12月，我被英国当局拘捕，问我是否“潘先甲”？我答是潘达章，不是潘先甲，又搜不出证据，在监禁半年之后于1928年把我驱逐出境了。回到广州之后，又在当时的市公安局惩戒场坐了半年牢，1928年12月出狱之后，才由济难会介绍到香港找到了省委并在省委机关工作。1929年10月，省委再次派我回南洋各地找寻和动员广州暴动失败后逃难到南洋各地的革命同志，特别是军事人员，回国参加武装斗争。本来我是被英国当局驱逐出境的人，去是很危险的，但是为了革命的利益，我就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从香港出发，路经安南（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新加坡等地，沿途找到党组织之后，就传达省委的决定，要他们认真做好这项工作。当到达新加坡时，为了避开英警的追捕，通过南洋党组织和工会，安排到日本人开办的台湾银行的楼

上住，门口由印度人当守卫，这里英警不来搜查，倒很安全。当把任务布置下去并顺利进行的时候，我便于1930年1月搭船回到香港省委机关工作。这次我重返南洋虽然是冒险的，但任务完成得比较好，在南洋各地党组织和工会、青年团组织的努力下，先后已动员了二千人左右的军事骨干、工人、学生重新回到祖国参加武装斗争，把他们安排到广西的左右江根据地一带的红七军和红八军，还有一部分则安排到在东江一带的红四十八、四十九团工作。

(四)

我于1929年1月到1930年8月（除了中间有三个月在南洋外）都在省委和华南分局工作，初时负责机关的秘书工作，数月之后，因为省委秘书长吴炳泰同志出巡东江，党要我担任代理秘书长职务，及后又调到省委交通处当主任，总之我成了一个管家婆了，什么都要管，内交、外交、秘书、财务、招待所都得管。当时中央从苏区拨些金条给我们当经费，我就拿去金铺兑换，由于兑换的数量多，而且金条上又有“吉安”字样的烙印，引起老板的怀疑，说这是共产党那里来的，于是我就把金条拿回，用分散的办法，这里换一点，那里换一点，这样才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我在香港省委机关工作的地点是坚尼地城，但宣传部、招待所以及其他办事机构则分散到其他地方，当时省委的主

要负责人最初是由罗登贤（又名先生）当书记，不久又调走，由黄钊当书记，黄不久又调去中央，便由卢永炽来当书记。罗登贤后来的情况不知怎样，可能是牺牲了。黄钊调去中央后不久就脱党回香港做工。卢永炽这个人品质不好，在困难的情况下竟拐带省委的公款逃跑去澳门开铺头当老板了。

1930年7月间，发生了一个严重事件，就是省委内部的内外交通叛变——即内部的交通员莫叔宝、中央交通员林瑞两人叛党，省委机关受到破坏，香港当局到处捕捉我同志，我所以能幸免，是由于当时正在出差潮汕取经费，回来时在街上正好碰见饶君强（即饶卫华），他告诉我省委出事的情况，叫我不要回去，也不要再在街上跑，先找个地方避一避，我就去广泰客栈住了两个晚上。当时打听到聂荣臻、李富春同志是属中央军委那条线的，没被敌人发现，通过饶卫华的联系，与李富春、聂荣臻接上了关系，他们就介绍我去上海党中央那里去工作，因而得脱险。听说省委受破坏那天，正好主要领导干部都集中在牛屎湾开会，特务前去逮捕时，整个省委都受破坏了，这是一次重大的损失。

（五）

1930年9月到1931年1月这四个月的时间，我在上海党中央工作，当时我到上海后，在四马路一间旅店招待处住了一个多月，中央分配我在发行部工作。当时中央发行部负责

人是李子英和毛泽民二同志，他们分配我在华德路某发行处管理《红旗报》及《群众》的发行，并负责联络二间印刷厂的工作。但是，在1931年1月中央机关又出了坏人，受了严重的破坏。据我所知，这次事件是当时中央宣传部长罗绮园叛变，被敌人抓去十七个人，十三个人被杀害，其中包括杨匏安同志。由于我新去中央工作，罗绮园不认得我，没掌握我的名单，所以我没有被杀掉。另外还有两个工人一个学徒（即向忠发的儿子）连我共四人只判刑坐牢，没有被杀害，我被判处十年徒刑，其余两个工人判六年，向忠发的儿子判二年半。我是在上海虹口华德路某巷印刷厂中被捕的，正好那时我送华岗同志翻译的一本苏联军事学单行本稿子去付印，被侦探当场逮住，当时包打听（即侦缉）们以为我是另一个机关来的人，想从我的线索中发现其他的机关，好进行破坏，因而出尽了看家的本领对付我，什么引诱、拷打、甚至用针刺我的手指头，用木棍与拳头打我的脑袋（至今仍有脑痛的后遗症），要我供出新的机关来，我并没有向他们屈服，只说自己是工人，负责接稿送稿的，他们看我穿的是工人服装，但身上又有一个怀表，又怀疑不是工人，可是查来查去没有任何证据，而我又不承认，只好判比其他工人重一点的刑了事。后来因为我在狱中组织党支部，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又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司法部门追加十年徒刑，总共二十年，从此，我又进入新的斗争——在狱中的生活。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实现了国共合作，才被释放出来，回

到党的怀抱。

(六)

出狱以后，我到陕北根据地中央党校十二班学习，接受组织的审查，对狱中表现作出结论，然后分配回广东工作。由于走时我肺病严重，加上叛徒廖独航追踪厉害，为了照顾我的身体和安全，在香港搞了一年多的海员工作后，党便调我去南路工作和养病。身体恢复健康后，由于工作需要，又调到香港做海运工作。海委书记最初是冯燊同志，后来是李雨峰同志。这是1946年5月——1950年5月的事。鉴于我在抗战时曾负责过海员工作，对海员的情况了解，抗日战争时期这些同志分散在国外各埠，因长期战争的影响，他们和党已失去联系，在抗日后，他们从国外屡次写信回来香港海员工会找党，要求恢复组织关系。党为了加强国外同志通讯及做联络工作，根据过去地下工作经验，有建立通讯站的必要，同时又感到海员中党组织经济的困难，想从做生意中赚些钱来补助党的经费，因此我一面做生意，一面做海员中党的工作。这时适有几位海员同志从外国返港，我便把他们的资本集中起来，于1946年8月进行开设南风餐厅（公股五分之一），藉此和海外同志联络，和美国、澳洲、英国各埠的海员同志经常连络，并保持他们和党的关系。1947年5月又建立陶苑餐室（内有公股资本数千元），建立半年后，美国岑

松同志等又集资寄给海委，由海委书记李雨峰同志要我再开餐厅，以作为和美国海员同志连络的基地，于1948年12月又开设南洋餐厅（内有公股四分之一），由我负责该餐厅的经理，从此，我成为一个公开的商人了。我曾用商人的名义和地位，公开在商场上做各种活动和进行我们党的经济工作，这时琼崖党的负责人李明（即林李明）同志要我出来主持琼崖旅港同乡会，在党的同意下，又参加琼崖同乡会工作，在1949年3月间，该会开全体会员大会时，我被选为该会的理事长。由于该会过去在社会上曾有过多次政治活动，如捐款援助八路军、琼崖独立大队，组织旅港同乡回国服务团，通电反对国民党向敌投降，拥护抗战等，政治色彩很浓，曾引起香港政府的注意，新改选不久，英帝国主义就把该会和三十八个团体一样当作非法团体而拒绝注册，限令取消，经过抗议斗争，才把事情和缓下来，并搁置数月，到1950年春海南岛将解放，该会曾由我发表谈话，号召全体会员支援前线，海南全岛解放后又开会庆祝、捐款劳军及对四野、琼崖纵队等部队通电致敬祝贺，使英帝国主义对该会更加注意，同时我个人的行动也引起港英政府的注意，而成为他们侦探部门调查研究和跟踪的对象，因而，我就被派回广州工作，离开了香港。

调查整理人：胡提春、王焕秋

1979年3月22日于海口